

WU XU WEI XIN YUN DONG YU GUI ZHOU

贵州

戊戌维新运动
与

贵州人民出版社

贵州省史学会 编
贵州省政协文史学习委员会

戊戌维新运动与贵州

纪念戊戌维新运动 100 周年学术研讨会文集

贵州省史学会^编
贵州省政协文史学习委员会

贵州人民出版社

戊戌维新运动与贵州

著 作 人:贵州省史学会 贵州省政协文史学习委员会 编

责任编辑:孟筑敏

封面设计:朱 桦

版式设计:祖 铭

出 版:贵州人民出版社(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邮 编:550004

印 刷:贵州云商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850×1168 毫米 1/32

字 数:260 千字

印 张:10.375

印 数:1000 册

版 次:1999 年 3 月第 1 版

书 号:ISBN7-221-03821-X/K·436

定 价:30.00 元

黔版图书,版权所有,盗版必究

黔版图书,印装错误,随时更换

目 录

- (1)在戊戌维新运动与贵州学术研讨会开幕式上的致词…………… 龙志毅
……………
- (4)在戊戌维新运动与贵州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王三运
- (8)谭嗣同、梁启超与近代青年精英文化 …………… 罗福惠
- (29)略论梁启超谋救光绪皇帝的活动
(1898.9~1900.9) …………… 耿云志
- (43)维新与觉醒
——应该如何评价维新派的“启蒙”与“新民”? ……………
…………… 林家有
- (53)改革贵先行
——谈戊戌变法与西南 …………… 谢本书
- (60)戊戌维新运动与近代中国民主主义运动 …………… 吴雁南
- (67)甲午战争与戊戌维新运动 …………… 熊宗仁
- (81)未必儒生逢世难,悲凉偏起杞人忧
——对戊戌维新失败原因的再认识 …………… 张新民
- (95)中国的政治近代化与戊戌变法 …………… 肖先治 李双璧
- (106)戊戌维新与近代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 黄 群 尹瑞华
- (116)戊戌维新与近代科技在中国的命运…………… 周松柏 胡晓登
- (126)简析维新派对洋务派、保守派关系处理上的失误
——戊戌变法失败原因再分析…………… 马先彦

- (139)论戊戌时期的教育改革…………… 张羽琼
- (150)怎样评价中国近代以来历史上的
社会革命与变法、改革…………… 严士琦
- (156)关于戊戌维新和商鞅变法的思考
——纪念戊戌变法 100 周年…………… 蒙礼云
- (169)京师大学堂创建源流考…………… 钟家鼎
- (177)论维新志士的爱国主义思想…………… 唐建华
- (186)康有为的“大同”理想…………… 于民雄
- (195)略论康有为的《大同书》…………… 柳蕴琪
- (201)戊戌时期康有为的思想特征：
政治上的激进与文化上的保守…………… 周术槐
- (210)梁启超对科举制度的反思…………… 曾凡炎
- (217)论梁启超文化人格的意义…………… 苏艾平
- (223)公德·开拓·进取
——梁启超“新民”观的历史启示…………… 肖良武
- (233)谭嗣同、唐才常维新思想比较…………… 李少文
- (245)谭嗣同与清末理想人格追求思潮…………… 刘纪荣
- (253)谭嗣同的殉难心态与儒佛两学
——兼谈墨学对谭氏的影响…………… 张成洁
- (261)千秋功过，谁人评说？
——试论维新志士刘光第…………… 罗惠缙
- (269)试论《新政真诠》的政治改革思想
——纪念戊戌变法 100 周年…………… 张旗
- (277)从戊戌变法看晚清贵州知识分子的变革意识…………… 林建曾
- (287)维新思潮下的贵州近代教育与贵州的近代化…………… 林芊
- (298)论维新改良思潮在贵州的传播及其

对贵州辛亥革命的影响

——纪念戊戌变法 100 周年 宋洪宪

(305) 贵州人与戊戌变法 王羊勺

(313) 戊戌变法时期新学在贵州的传播与影响 韩义义

(320) 回顾历史 激励后人

——戊戌维新运动与贵州学术研讨会小结 冯祖贻

(324) 后记

在‘戊戌维新运动与贵州’ 学术研讨会开幕式上的致词

龙志毅

尊敬的各位学者、专家、朋友们、同志们：

今天，戊戌维新运动与贵州——纪念戊戌变法 100 周年学术研讨会在大家的关心、支持下开幕了。我谨代表贵州省史学会、贵州省政协文史学习委员会，向前来参加这次会议的省内外嘉宾表示热忱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向参加今天开幕式的省领导表示诚挚的谢意！

1898 年发生的戊戌变法，已经过去了 100 年。历经百年沧桑巨变，特别是经过 20 年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我们对戊戌维新运动的历史价值和现实的借鉴意义看得更真切了。甲午战争的失败，引发了空前的民族危机，促成了自鸦片战争之后就兴起的维新思潮向政治运动的转化，终于出现了“百日维新”的惊世之举。站在世纪之交的门槛上，回顾维新运动的发生、发展和失败，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救亡图存”是中国近代最能激励民族精神的时代主旋律，一切近代意义的改革和革命的内在精神动力都植根于此。戊戌维新运动所掀起的改革浪潮，集中地表现在发展资本主义经

济和建立资本主义的君主立宪制度这两大中心之上,其要求变革的领域,几乎涉及到清末社会的方方面面。正是有了维新运动对爱国主义的张扬,对理性的激发,对民智的启迪,对迷信和愚昧的反对,对西方先进的科教文化、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学习倡导,为辛亥革命最终推翻清王朝作了一系列的必要准备。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戊戌维新运动就没有辛亥革命。

戊戌维新运动对中国近代历史的深远影响,对民族精神的巨大振奋,可以从僻处西南的贵州得到具体的反映。以贵州知识阶层为代表的各族人民,在国家民族生死攸关的时候,一反封闭、落后的故态,发出了时代的强音,以超常的步伐,一度站到了时代的前列,推动了维新运动的发展,也改变了贵州封闭落后的社会风气。

在1895年5月的“公车上书”中,签名的16省举人共603人,而贵州就占95人,签名人数之多,仅次于广西,居全国第二。在1898年成立初具资产阶级性质的爱国团体“保国会”时,在京师保国会题名的15省籍的186人中,有贵州籍的9人。他们是贵州知识阶层忧国忧民、勇于变革的先进代表。

贵州籍的京官李端棻,是名噪一时的主张维新、举贤变法的维新派官员。1896年6月21日,时权工部侍郎的李端棻上疏光绪皇帝,“请推广学校,以励人才而资御侮”。他的这道《请推广学校折》,是中国近代教育的一大转折,也为戊戌变法作了探索。在戊戌变法前夕,他密荐康有为、谭嗣同于光绪帝,以自己的名义联络九卿上书,请求变法,与康、梁相呼应。在实授礼部尚书后,执掌全国教育行政改革,成为“二品以上大臣言新政”的第一人。他在戊戌政变后获罪贬谪新疆,初衷不改。遇赦回贵阳后,仍然实践自己改革教育、主张学习西方的理想,至死未悔。

1895年至1897年出任贵州学政的天津人严修,与贵州的爱国知识分子一道,愤于《马关条约》之丧权辱国,锐意改革,在贵州创

设官书局,改革书院,创办“经世学堂”,奏开经济特科,启维新之原点,发变法之先声,为举国所瞩目。

贵州的有识之士,在维新运动的鼓舞推动下,创设“黔学会”、“仁学会”,宣传维新变法,学习西方,使落后闭塞的贵州在政治上与时俱进,为尔后辛亥革命在贵州的发动和胜利培养了一批骨干力量,也为贵州在中国近代史上书写了闪光的篇章。

研究戊戌维新运动与贵州这一课题,既是弘扬贵州的历史文化,也有利于戊戌维新运动史研究的深入,更可以启示今天贵州富民兴黔的智慧。

朋友们,会议虽然短暂,欢聚却是难得的。特别是外省的专家不远千里万里给我们送来他们最新的研究成果,带来研究维新运动史的最新信息,增添了会议的光彩,提高了会议的学术品位,是我们贵州史学界和文史工作者的荣幸!

愿大家在贵阳的欢聚留下美好的记忆!

预祝大会圆满成功!

谢谢!

(作者单位:贵州省政协)

在戊戌维新运动与贵州 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省委副书记 王三运

大会主席、各位代表、同志们：

今年适逢戊戌变法 100 周年。贵州省史学会和贵州省政协文史委联合主持召开了这次“戊戌维新运动与贵州——纪念戊戌变法 100 周年”学术研讨会。在此，我谨代表中共贵州省委、贵州省人民政府，向研讨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向与会代表，特别是远道而来的省外代表表示诚挚的欢迎！

100 年前在中国大地上发生的戊戌维新运动，是一次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政治运动，也是一次救亡图存的爱国运动，更是一次深刻的社会变革运动和思想解放运动。戊戌维新运动虽然失败了，但它大大推动了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进程，为后人提供了宝贵的精神遗产和可资借鉴的历史经验教训。贵州的先贤们当年曾积极投入了这场运动，同时，这场运动对贵州的经济社会发展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今天，我们在这里纪念戊戌维新运动，既是对历史进行回顾与反思，更是要从中获得启迪和思索，用以指导我们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关于戊戌维新运动的意义及其与贵州

的关系,刚才龙志毅同志已经作了很详细、很精彩的论述,下面,我想着重从在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五大和省第八次党代会精神,把富民兴黔伟大事业全面推向 21 世纪的过程中,戊戌维新运动所提供给我们的启示与借鉴,谈几点个人的感想。

一是要大力弘扬戊戌维新运动中所表现出来的爱国主义精神。中华民族从来就有着强大的凝聚力和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这种精神积千年之精华,博大精深,根深蒂固,是中华民族生命机体中不可分割的重要成分。中华民族在五千年的发展中,历经磨难而信念愈坚,饱尝艰辛而斗志更强,都离不开这一精神。在戊戌变法中,戊戌六君子的慷慨赴难也充分展现了这一精神。我们贵州人更是有倘为国事,敢为事先的精神。历朝历代,都有贵州人在国家民族危急关头挺身而出,甚至洒热血捐头颅者。如南宋末年的播州冉氏兄弟、明末的何腾蛟等。在戊戌变法之初,在公车上书上签名的贵州士子就有 95 名,占实际签名 600 余人的近六分之一。他们在听说即将签订的《马关条约》是一个使中国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时,虽明知朝廷有“士人不得干政”的禁令,却置个人得失利害于不顾,联名上书,奔走呼吁,终于使死水一潭的中国社会渐起变革的波澜。因此,研究维新运动历史时,既要注意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也应该记住这些贵州士子。从现在起到下世纪的前一二十年,对于我们党和国家,乃至贵州省来说,都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时期。我们的发展进入了从第二步战略目标向第三步目标迈进的承上启下的关键时期,改革处于全面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攻坚阶段,要确保实现跨世纪的宏伟目标,更需要继承和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激励全省广大干部和群众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二是要大力弘扬戊戌维新运动中所表现出来的顽强拼搏精神。甲午之役,山河破碎,举国震惊,危机意识迅速弥漫于整个社会。康有为、谭嗣同等维新志士,深感“人人有亡天下之责,人人有

救天下之权”，提出了一系列的变法主张。从1898年6月11日起的103天中，光绪帝连续颁布了数十道变法命令。虽因守旧势力的顽固，戊戌变法惨遭扼杀，但维新变法乃是一种时代潮流，不可逆转。相当一部分维新志士抱着“萌芽新政要推行”的宗旨，积极宣传西方新学，使维新派提出变法的若干合理主张在后来的社会实践中大都得以实现，并为辛亥革命作了必要的思想准备，其造就的一代具有资本主义思想的爱国知识分子，大多也成为了辛亥革命的中坚力量。从戊戌变法到今天的100年里，我们的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当年维新志士所焦虑的救亡图存问题已不复存在。但社会经济生活中仍有相当多的棘手问题需要解决，如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对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提高整体经济素质和效益，搞好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工作等，任务重，难度大。同时，经济全球化趋势持续发展，世界科技进步一日千里，综合国力竞争日益激烈，以及金融危机严重冲击亚洲经济乃至世界经济等，使我们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极其复杂的国际环境。在前进的道路上，面临着许许多多的困难和问题亟待解决。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新的机遇和挑战、新的情况和问题，迫切需要我们弘扬顽强拼搏的精神，把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三是要大力弘扬戊戌维新运动中所表现出来的改革创新精神。当年积极参与戊戌变法的贵州人普遍都有一种追赶潮流，勇于得风气之先的创新意识。鸦片战争之后的贵州，因历史和地理的原因，经济文化远远落后于沿海发达地区。因此，近代的贵州志士仁人亟欲改变现状，努力追赶时代潮流。以当时在京城为官的李端棻为例，他不仅积极参与和支持维新变法，成为当时朝廷中二品以上大员“言新政”的唯一一人；且突破封建士大夫的思想模式，大胆主张学习西方、学习日本，希望“儒修料想兼中外，西学昌明更欲东”，在变法失败回乡后，他仍不改初衷，经常向贵州经世学堂的

学生传播培根、卢梭的启蒙思想,灌输“民权自由真理”。在当时,这种创新意识是极其难能可贵的!自此以后,贵州人一直保持这种追赶潮流的精神,辛亥革命、护国运动、五四运动……,贵州都不曾落伍,其原因之一,即在于此。当今世界,国际社会正处于从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过渡的新时期,以知识为基础,直接依赖于知识和信息的生产、扩散及应用的知识经济,必将在 21 世纪世界经济中占主导地位,国家的知识创新能力和技术创新能力,将成为决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前途和命运的重大因素。尤其是在全面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更需要我们继续弘扬改革创新精神,不断吸取新知识,创建新机制,使贵州得以更快的发展。

最后,预祝此次学术研讨会取得圆满成功!希望与会代表在贵州期间生活愉快!

谢谢大家!

谭嗣同、梁启超与近代青年精英文化

罗福惠

青年精英文化是既有别于传统主流文化,也不同于有“文化”、有经营管理之道、甚至有技术理性,但或缺乏学理、或缺乏人文理性和终极关怀的娱乐文化、商业文化和科技文化的文化。其出自尚未取得“条教号令”资格和地位的青年士人或青年知识分子,是他们对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的全面思考,对民族、国家乃至全体人类的历史、现状及未来的深层理性探索,其中尤其明显者,是他们济世救人的变革主张和将其付诸实践的担当行为。中国近代的青年精英文化,在维新运动时期才首度出现。辛亥革命前后、“五四”运动前后,又分别出现了第二波、第三波青年精英文化。本文仅以谭嗣同和 1898 年年底以前的梁启超为论析对象,对维新运动时期的青年精英文化的形成条件、内容、特征和其他相关问题加以考察分析。

—

所谓传统主流文化,是指以“仁—礼”结构为核心的思想意识及其文化构成,以纲常伦纪为取向的行为规范,以重农抑商、重义

轻利为导向的社会价值和人生教育目标等系统观念。传统主流文化因这些实质和特征而具有调适统治阶级内部关系、为官吏和士人提供安身立命的理想和准则、引导和约束全体社会成员的功能和特定的现实理性精神和对社会人心的统摄能力。传统主流文化主要的文字载体,就是儒家经典、官书正史、诗词文章,而其贯彻和传承,则是通过“官学”和书院课士,以时文科举选才来实现的。因而在传统社会里,人们从幼、少到青、壮年,基本上都处在传统主流文化的薰陶和塑造之中,没有特殊的独立的文化价值观和发展取向。

远在鸦片战争之前,传统主流文化的停滞、僵化、繁琐、徒有形式而无实效等弊端,就已渐被明敏之士所认识,但当时尚缺乏产生新质文化的条件,故深刻如龚自珍,也只能“药方只贩古时丹”。进入近代社会以后,从魏源、徐继畲开始,中经冯桂芬、洪仁玕,到王韬、郭嵩焘、郑观应、康有为等人,一方面有感于中国所面临危机的日益深化,一方面利用更为便利的条件多方面地借鉴西学,因而能对传统主流文化作出更多更深入的批判和反省,传统主流文化的一尊地位已经岌岌可危。以谭嗣同、梁启超为代表的第一代青年文化精英,就是在这种脱胎于固有文化、但汲取了中国固有文化的积极因素和正面价值、且融合进大量西学成分的新型文化已渐趋形成的条件下应运而生的。

谭嗣同和梁启超都明确谈到了自己的变化过程。前者说,“嗣同不慧,蚤为旧学所溺,或恒订辟积,役于音训;或华藻宫商,辱为雕虫”,“卒不克自致于当世有用之学”。而“三十之年,适在甲午,地球全势忽变,嗣同学术更大变”,“过此以往,方当金匱刮目,慧剑剗胸,上九天而下九地,魄万生而魂万灭,长与旧学辞矣”^①。此前,谭嗣同主要是学习训诂、考据、词章,也揣摩过八股制艺。同时他已初涉西方算学、格致、化学、人体医学(时称全体学)、化石学和西方宗教。1896年春后又受夏曾佑、杨文会影响而习佛学。在中

国固有文化方面,古代对谭嗣同有较大影响的是孔、墨、孟、荀、庄和王充,近世和当时则分别是王夫之和康有为,故他在30岁时曾说“迺为学专主船山遗书,辅以广览博取”^②。1896年通过梁启超的介绍,了解了康有为的学说,“乃大叹服,以为扫除乾嘉以来愚谬之习,厥功伟;而发明二千年幽郁之经学,其德宏”^③。1896年秋又声称“三代下无可读之书”,表示“今日急务,无有过于开学派者”^④,因而亟思通过“自治”,“别开一种冲决网罗之学”^⑤。通读《谭嗣同全集》就会知道,《仁学》即“冲决网罗之学”的书名,是维新运动时期青年精英文化的代表作品。

梁启超在1889年(十七岁)中举之前,所学不外时文帖括、训诂词章,中举后又入广州学海堂治经学。1890年入京会试下第,途经上海,购读徐继畲的《瀛寰志略》,才知有五大洲各国。同年秋,认识康有为,“先生乃教以陆王心学,而并及史学西学之梗概。自是决然舍去旧学,自退出学海堂,而间日请业南海之门”。从1891年起,在万木草堂一边从康有为学习,一边协助康教学和编著,因而康有为此期撰写的《公理通》、《大同学》、《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春秋董氏学》等,梁启超均得先闻。康有为在万木草堂讲“中国数千年来学术源流,历史政治沿革得失,取万国以比例推断之”,从观点和方法深刻地影响了梁启超。甲午中日战争爆发,梁启超“愤愤时局,时有所吐露,人微言轻,莫之闻也。顾益读书,治算学、地理、历史等”^⑥。1896年在上海时从马建忠学拉丁文。当时他于西学不甚了了,故对“从西学入”或融通中西的容闳、陈炽、马建忠、严复等人,几近倾倒;思想上缺乏独立性和自信,承认自己“行事之念多,而穷理之功少”^⑦,并说“学问不成者,其将挟何术以救中国也”?故曾主张“入山数年,方可出世”^⑧。但危殆的时局、激剧的变革大潮及其本身的救世济民之心已不允许他再从容读书了。

青年精英文化不再停留于书斋,尘封于著述,却很快广为人

知,与上世纪90年代刚刚风行的报刊大有关系。梁启超曾说:“去塞求通,厥道非一,而报馆其导端也”。中国人自办报刊之始,虽不如“西人之大观”,但至少可以“广译五洲近事”,“详录各省新政”,“可以奋厉新学”,“旁载政治学艺要书。则阅者知一切实学源流门径,与其日新月异之迹,而不至抱八股八韵考据词章之学,枵然而自大矣。”^⑨他于1895年夏在北京创办《中外纪闻》,“日日执笔为一数百字之短文”。翌年赴上海办《时务报》,接着又协助办澳门《知新报》,两报索稿孔亟,他几乎“每日一文”。谭嗣同亦重视报刊的作用,他称报纸“日一出之,其于日新之义庶有合也”,而且影响范围广,于一省、数省乃至全国之人,“予之耳,而授以目,而通其心与力,而一切新政、新学,皆可以弥纶贯午于其间而无憾矣。”^⑩故曾以为“居今之世,吾辈力量所能为者,要无能过撰文登报之善矣”^⑪。他参与了《时务报》、《湘学报》、《湘报》的报务工作,支持过《算学报》,还一度筹划在南京开《矿报》,在武汉办《民听报》。这些报刊无疑成了宣传维新变法、传播青年精英文化的有力工具。

再次,各种学会和新式学堂也有利于青年精英文化的交流和播散。谭嗣同高度评价学会说“大哉学会乎”,“士会于庠而士气扬,农会于疆而农业昌,工会于场而工事良,商会于四方而商利孔长”。“学会成而学成。近之中国,远之五洲,……菁华荟萃,终朝可定,于是无变法之名而有变法之实”^⑫。他还积极参与创办南学会、农学会、矿学会、金陵测量会、群萌学会、延年会、不缠足会等学会。梁启超在1894年曾说,“我辈在今日有何事可为?只有广联人才,创开风气,此事尚可半主”,“今日之事,以广求同志开倡风气为第一义”^⑬。1897年说“欲兴民权,宜先兴绅权。欲兴绅权,宜以学会为之起点”^⑭。他参与过强学会、南学会、不缠足会、保国会的创办,还一度想组织全国保教会。当时维新派还认为“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废科举”^⑮。极力鼓吹开办新式学堂,并亲自开办了浏阳算学馆和湖南时务学堂。